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 鲍吾刚 著 严蓓雯 韩雪临 吴德祖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 鲍吾刚 著 严蓓雯 韩雪临 吴德祖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

中国人的幸福观

本书着重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堂观和乌托邦观念，分析了天堂观和乌托邦思想在中国人寻找幸福之途中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对幸福的期望和追求，和西文一贯所认为的“中国一直都在向后看，他们的全部理想都是从过去中吸取的，他们对未来不感兴趣”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中国也有着对现世与未来的憧憬，在传统儒释道思想以及现代西方思想的杂糅下，呈现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天堂观、乌托邦思想和有关理想世界的观念。本书按照历史的线索，分五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先秦不同学派对于幸福的不同理想，汉代董仲舒的天道循环论对幸福的影响，以及魏晋时期的佛道思想、宋明理学和 19 世纪各种思想流派对幸福的探索。本书引征的材料不拘常规，自由广泛，不仅有常见的儒释道思想文本，还涉及到许多边缘的内容。除了材料丰富翔实外，作者的文笔也是细致而富有情感，由此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幸福观的种种不同表现，常有些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掩卷深思。

上架建议：中国哲学

ISBN 978-7-214-05985-7



9 787214 059857 >

定价：46.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幸福观/(德)鲍吾刚著;严蓓雯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8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

ISBN 978-7-214-05985-7

I. 中… II. ①鲍…②严… III. 人生哲学—研究—中国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7040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人的幸福观 |
| 著 者 | [德]鲍吾刚 |
| 译 者 | 严蓓雯 韩雪临 吴德祖 |
| 责任编辑 | 孙 立 |
| 装帧设计 |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
| 责任监制 | 王列丹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book-wind.com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960 mm×1 304 mm 1/32 |
| 印 张 | 16.875 插页 4 |
| 字 数 | 460 千字 |
| 版 次 | 2009年9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05985-7 |
| 定 价 | 46.00 元 |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译者的话

鲍吾刚(Wolfgang Bauer, 1930—1996)是上世纪德国汉学界继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之后影响最大的汉学家。卫礼贤是传教士,尚致力于以翻译《老子》、《庄子》等中国经典向德国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鲍吾刚已经在德国早期汉学的基础上,广泛阅读研究中国典籍及历史资料,尝试为中国这个古老而蕴涵巨大能量的国家勾勒一幅全貌。这份“野心”的最好体现就是于1971年出版的巨著《中国人的幸福观》(*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而此书的副标题“中国文化史四千年反复出现的主题”正提示了此书的核心“寻找幸福”。

正是以“寻找幸福”为枢纽,鲍吾刚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串联了起来。他在序言中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人寻找的幸福是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幸福”以及“他们希望这幸福是在此时此地还是彼时彼界找到”,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坐标。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横轴,以中国人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思考、探询、经历和付出为纵轴,鲍吾刚耐心细致又极富洞见地为读者一一展示了中国的典籍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思想。他对中国文化内涵的全面阐述、对中国思想深刻而独到的分析,使得这部著作不仅成为德国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也成为研究西方中国观的显著界标。甚至,对

中国人自身来说，这部著作也不啻为反观自己历史与文化的折射之镜。

本书第一章在探讨中国人如何界定“幸福”的基础上，介绍了中国自有史之始到先秦各学派幸福概念。从对中国古文字的语源学分析、到对夏商周贞卜活动的描绘，再到以何为及何能幸福为中心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勾勒，鲍吾刚在这一章里论述了中国思想孩童期对生命、死亡、过去、现世、未来等等的认识。是热爱人世还是热爱自然，是讲求秩序还是逃离社会，是追求礼法还是个人享受，中国人对幸福本质的体验和认识在历史之初已经定下了几条不同道路的基调。

此后，中国一直在这些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上徘徊、挣扎。或者想一口气跑到底，却被尽头的残酷景象给吓回来；或者想将这几条道路拓宽合并，变成大同之堂堂大道，却只发现增长了内在的冲突。在这种对幸福的寻求中，中国不仅试图在时间上重新界定过去与未来，通过循环论延续他们认为历史中早就存在并一直存在的“大一统”，并试图在空间上发现东西南北四方极地的“仙境”。第二章正论述了公元前200至300年这段时期的思想面貌。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异域思想的进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次便是佛教的引入。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带来了幸福实现之地的变化，也带来了时间的消失、自我的消失等等命题的新生命力。这些变化不但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中国人对幸福的想象，也赋予中国文学中一些传统主题——如洞穴后的桃花源——以奇异而瑰丽的色彩。只可惜，在思想杂糅爆发出惊人活力的这段时期之后，中国的幸福观再次被套上现世的枷锁。此书也从第三章对迷恋彼岸世界的叙述转向了第四章“现实的尘埃”。

儒教经历了一千多年与（中国本土以及印度西域的）各种思想潮流的搏斗，终于获得了普遍的胜利。但胜利的另一面，便是世界的收缩。彼岸被抛弃，未来就是现在，幸福在于此时此刻的把握。在对宗教理想的压制中，儒家强调“忠”、“诚”是幸福的根本，“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理想的未来。虽然不断有各种秘密团体挑战儒家理念，虽然儒家内部也经历了怀疑、急躁与改革的尝试，但历经几个朝代的征战、扩张，版图宏伟的中国终于让儒家沉浸在“天下即中国”的甜美幻景中。直到又一次异域思想的入侵，把它从美梦中唤醒。

这一次入侵的西方思想给中国带来的是创痛。它让中国忽然发现天下很大，除了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它们不仅风俗与“中原”各异，而且在某些方面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耻辱的打击中，仁人志士都在寻求救世良方。在他们眼中，中国漫长的过去再一次作为取之不竭的源泉，重新为中国人提供着信心和保证。在未来的大同世界中，中国虽然不再是中心，但它的精神财富、文化底蕴将永远可以作为大同世界的标准。自晚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正用各种办法尝试寻找更美好的未来。

鲍吾刚勾勒的中国这条寻找幸福的道路，其间充满着各种思想的交锋。在不乏主观判断的细致论述中，鲍吾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精神氛围和社会政治思想。此书有两大特色使得这种展示独具特色。一是对材料的运用。鲍吾刚在其604页（原文德文版）的著作中，征引的文献不仅遍及中国经典典籍、佛藏道藏、近现代学者论著，还涉及到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都相对偏门冷僻的材料。在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中，鲍吾刚显示出他广阔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从那些似乎被其他汉学家“看熟看透”的经典文献中，发现了在对所谓陈词滥调的重复中能征兆思想流变的细微变化，也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文献的背后，追踪着中国人寻找幸福的努力。对这些材料的搜集和运用，充分反映了鲍吾刚视野的开阔和反思的深度。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即鲍吾刚对民众思想、秘密社团等问题的重视。中国人对幸福的寻求绝不仅仅只体现在经典典籍内，也不仅仅体现在主流思想中，在民众的混杂信仰、在秘密团体的一些通俗诉求中，往往有着中国人幸福观最直接、最丰富的展现。在鲍吾刚的这部著作中，有部分论述一直追随着中国社会

里这条“隐秘”的线索，而鲍吾刚的解读也向人们提供了审视中国另一面的角度。

鲍吾刚理解中国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他一生 16 部论著和 60 余篇论文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非常注重对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研究。比如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命名》就从中国人的起名来论证中国人的个性绝不是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没有独立人格”。他认为中国人的名字（包括大名、字、号等等）不仅与展望未来的幸福有关，还有着与家族、历史、记忆的深刻关联。这本著作涉及了以往汉学没有涉足的领域，也昭示了他后来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对中国幸福观的探索。而另一本《中国人的自我》则对中国历代自传文学进行了综述，从中考察了中国人“自我”的形成与发展。他的这种独特论述角度、从细节入手的分析方法也体现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在此书中，他从汉字的字源来分析中国对幸福的认识，从“旅行”这个角度探索中国对幸福的寻求，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比如，鲍吾刚一直以“游”为主题，追踪着中国人对去往远方（代表着幸福）的向往。通过飞翔或航海，中国人在现实中、在象征中表达对远方极乐净土的渴望。从这点出发，鲍吾刚极具想象又不乏说服力地将水与幸福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上自屈原投湖、李白溺水，下至王国维自沉，都是在象征意义上表明对此世污浊世界的舍弃，对彼界洁净永生的追求。甚至毛泽东的几次横渡长江，都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对横亘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的洪荒的克服。鲍吾刚的这种独到认识在此书中比比皆是，使得阅读此书成为挑战思想与愉悦精神的双重之旅。

此书这次重版，译者重新核对全文，仔细修订了漏译、误译之处。初版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及查寻的中文材料的原文，此次能找到的，也一一替换了原来由英文翻译的译文。当然还是会有不少错误存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严蓓雯

2009年8月

前 言

每一种幸福的形式——不管是个人幸福还是集体幸福——根本上^{ix}都是难以描绘的。它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无影无形,只有保持一段距离、当它披上色彩时才能辨识出来。如果想要忠实地描绘幸福是什么,那么情形总是如此:要么因太近而被蒙蔽,要么——更为常见的——因太远而模糊不清,只能感受到隐隐约约的一些轮廓。因此,在所有文化中,我们都能找到许多对荒凉之地和他世地狱的描写,它们被恐怖地呈现出来,在可感知的残酷中威胁着人类,人类于痛苦中是如此熟悉这些地方。但是一旦来到天堂,只有那入口是用清晰的笔调写就。所有的天堂都是已失落的天堂,存在于遥远的过去或遥远的将来,存在于另一片国土、另一个星球、另一抹苍穹中。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创造的所有关于幸福之国的图像是那么不真实、那么带有鬼魅色彩的原因,“使我们本来辉煌之心志变得黯然无光,像个病夫”^①。这些图像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一条很难表述的法则,根

^① “Sicklied over by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此为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景中哈姆雷特王子那段著名独白中的一句话。这里采用的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译者注

据这条法则,真正的幸福导致时空不存,只有在动态而不是在沉思中才能捕获住它。由此,所有依靠直觉建立的理想世界,都带着一种尴尬的厌倦、一缕天真、一丝虚伪,因为它们只能非直接地体验到:在它们出现时升腾着的快乐中,在它们消失时沉落着的悲哀中。

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幻象之永恒、巨大的力量,以及它们影响人类和国家的决定之深度。不是天堂的真实,恰是它们的虚幻引发了无敌的魔力。因为在一个看来不快乐、不公平的世界里,幸福只存在于对现实的颠覆中。如此情况下只能提供一个暗淡的天堂,一个无彩的理想世界,一种华而不实的生动图像。但即便天堂一无所有,不管怎么说,它都是逃脱的门洞,是摆脱困境的出口,是从恶魔底下脱身的地方,而这个恶魔的直接现实存在,自发地、带有巨大能量地用自己的灼热弥漫至它的对立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幸福的图像和它们那老掉牙的陈述所带有的明显普遍相同性,由此融入一些互相不同的、有时甚至互为对立的
x 概念中。但通过这种并置,同一个图像、同一个词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清晰性。它通过对立面获得了自身的定义。比如说,只有当和平、幸福、生命与争执、仇恨和死亡——这些概念看来很不幸地被更残酷地陈述着——两两相对时,以下这点才变得明显起来:它们频繁地在不同层面上使用,因此也经历了最显著的变形,它们的含义常常互相矛盾。

在对幸福的寻找中,询问一下寻找的首先是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幸福是非常重要的。这条分界线也划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希望幸福是在彼世找到呢,还是就在此世此地?这两个问题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它们在不同层面不同部分里出现时,必须要同时得到回答。在个人努力获取幸福的抗争中,某种悲观的东西从来没有缺席。它可能包括对社会的轻蔑——在社会中,人被当做完成它自我目标的手段。这种对权力的冷酷饥渴也许常常被以下这种感情削弱:被征服的大多数虽然被迫从精神上认同征服者的辉煌和壮丽,但因此也分享了处于上层的人的幸

福。然而,在这种“强者”的自我实现中,更为经常的是在“弱者”的听天由命中显示出一种悲观来,他们背弃社会,希望在其他领域里找到幸福。退隐倾向所呈现的形式变化多端,而最终取决于那些人所背弃的社会之结构以及社会统治人居世界之强度。其原型是那些放弃城市的嘈杂,逃入野山和荒漠中的隐士。在那里,他回归种族的孩童时代,失去自己的身份,再次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异类。但是,如果文明的界线变长,其外围和整个世界吻合,那就再没有什么蛮荒之地能幸存,隐士便不得不在他们自身之内寻找退避之所。他们屈从于一种奇怪的分裂:当被迫继续在社会内生存时,他们沉浸在冥思中——而且常常处于入迷状态——进入更接近于核心的人性的更深层次。在某种意义上,这和孩童时代的蛮族天堂非常相似,在那里,他们那早期时代更为幸运的同胞仍然可以赤身裸体无牵无挂地徜徉在自然中。从此地此时移居而出,常常和航海故事相符,航程创造了这样一种印象:一种广为散布的文明还没有侵占到天堂的领域,没有使天堂消失在它们的范围内,当文明本身在进步时,天堂转移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它们仍然存在着——就像它们一贯的那样——在它们该得的安详日光中等待降临,这些天堂也许在居住着神仙的难以攀临的山峰,在仙怪栖居的荒岛,或者在天上,那最后的不能征服的福祉之地。

这种潜意识存在于在文明的发展中,但同时也在每个个体生命中重 xi复着,从中渐渐超然而去是非常不容易被察觉的,它要通过许多中介的步骤。这种超然让“彼界”能够从未经驯化的自然中发展出来。彼界也许存在于外部世界,在地理上可以确认的那些地区,但也可能在个体灵魂的最深处。然而奇怪的是,它总是和意识来临之前以及对自我的认知还一无所知时的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回去的路越长,渴望回归的心就越强烈;如果这种愿望能实现,那所获得的福佑也越多。许多神秘主义者都描绘了放弃小我、同时进入一个更大的自我的愉悦感和个体灵魂的藩篱消解、从自我中脱身而出的自由感。但是,这些愉悦感和自由感的

痕迹,也可以从那些沾染宗教色彩的重要群众运动之信徒脸上辨识出来。个体的幸福和集体的幸福因此很好地契合了。

但是在社会之外、在此界之上的天堂,总是保留着它们作为避难所、作为天赐绿洲的特色。在此之外或之下,邪恶的世界却依然如故。这个邪恶世界也许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就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当人退避入天堂时它并没有消失。这就是躲避通常为时不长的原因。好像是受制于一种无法克服的重力法则,备感耻辱的自我通常在短暂的飞翔之后重新回到尘世之中。因为生来没有羽翼,天堂似乎不是为凡人而设。因为这个缘故,其他寻找幸福的人并不相信通过升天可以获得福佑,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升天,而这一小部分人,也似乎只是成功片刻而已。所以,他们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们将天堂带到人间。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其气质总是和那些想从此世退隐而出的人不同。他们对文明和社会的看法是乐观的。他们相信,或至少希望,劣状会得到改善,所有的痛苦将会减轻。甚至他们同意其他人的说法,认为世界之稳步不断的恶化是所有邪恶产生的原因。当然,即便在乐观主义者中,也有态度上的根本不同,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相当被动。一些人相信,天堂带着它的所有祝福慈悲地降临人间的那一刻即将到来,他们“等待着”。另一些人则坚信,他们能靠自己的努力稳稳掌舵,在此进程中遵循另一个方向。他们并不漫步云端,而是将双脚牢牢地踩在土地上,准备从天堂那里夺取幸福。然而这两种人都直面社会,认为只有世间的幸福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无飞地可言。此类人同样着眼历史,要么带着好奇观察它的进程,想从中辨认出拯救来临的希望;要么依靠自身来促进拯救的来临。

想要连接起天堂和人间的大胆想法,想要伸手触及星星的愿望,推翻了那些耸立在此世痛苦之谷和永恒幸福之土之间的墙——这些墙对那些想要飞离此世的人永远不会太高。天堂之光因此降临世间,但天堂

救可以在此世获得,那么天堂和人间就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有新的危险滋生,就再没有净土可去。所有人都被赎救,没有人会被拉下,虽然他的愚蠢或痛苦会使他自己的幸福成为问题。但是,如果拯救不能被实现,那么就只会留下一片呆滞的无望,即便暗示在有一定距离的将来,会有一些好事情到来,都不能减轻这种绝望。因为个体可以经常地——虽然只是暂时地——在此世充分地体验幸福,所以,相比那些相信幸福能够在社会里实现的大众,他能更容易地接受在彼界获得幸福之期望的无限延宕。因为那种期望是向那些尚未诞生的人在允诺一切,而对于在世者则一无所予。

中国是有着伟大人民的伟大之国。也许有人会说,它生来就耄耋老矣,像某种传说人物,但恰是因此,它总是在更新自身。有时它在沉睡,但它从没睡死过去。在它三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正是以它自己的性情经历了所有这些希冀幸福的形式。然而,在这些希冀幸福的形式中能找到的所有奇怪反例,并不是彼此抵消,仅仅留下一幅暗淡的、相同的图像。在对古代赐予的福祉的毫不动摇的此世信念中,像骨头一样坚硬的儒教人物,就和道家所想象出来的众多神人以及它总在重复地、无望地许诺人类的“长生”完全相反。但是,尽管存在着彼此矛盾之处,在所有有关个体和集体获得拯救的学说中都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在这些彼此冲突的见解之脉动中,某些元素不断地反复出现,而其他一些元素则令人惊异地很少露面,或完全缺失。某种轮廓因此准确无误地浮现出来。

在中国产生的几乎所有世界观中,与过去保持和谐一致的那种重要性广为人知。但是,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含义却仍然没有被充分理解。很显然,其所扮演的角色和西方思想里的那种尚古——最显著的是在沙漏这种形象中——完全不同,它形成一种和未来的关联,而且永远和被压缩的、集于一点的“现在”相连。在中国,过去就像是现在的拓展;它几乎总是构成了某种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将此时此世作为自己筹码的思想